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

□ 马佳佳 王 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重要科学判断，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内核，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根本遵循。立足新时代，从理论逻辑、内生逻辑、实践逻辑三个层面把握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有助于推动降碳、减污、扩绿与增长的深度协同，促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理论逻辑，价值共生与范式革新的内在机理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强调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辩证统一。在工业化的特定历史阶段，传统生产力受制于当时的技术认知水平，在快速推动物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以资源高投入为特征的线性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特定时期具有历史合理性，为人类摆脱贫困、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了物质支撑，但随着生态环境容量接近极限，其“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局限性日益凸显，逐渐偏离了马克思所揭示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平衡规律。

新质生产力这一原创性概念，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它并非对既有生产方式的简单否定，而是立

足工业化的物质基础与技术积淀，实现了生产力发展范式的系统性绿色跃迁。从价值共生层面看，传统工业文明一度将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置于对立面，而新质生产力将生态价值内嵌于生产力发展的全过程，将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破除了零和博弈的错误认知，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实现了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同向共生。从范式革新层面看，新质生产力依托绿色低碳、数字智能和新能源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深度改造与升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循环高效的新型发展范式，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实现从“相互掣肘”转向“有机融合”的历史性跨越。

内生逻辑，技术革新与要素重构的动能保障

在传统生产力模式下，受制于技术条件与市场发育程度，生态要素长期游离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范畴之外，导致企业生产往往以短期经济利益为导向，对发展的可持续性关注不足。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源于主观恶意，而是工业化初中期边际减排成本高昂，生态价值量化手段缺失的客观历史局限。

新质生产力作为以创新为主导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不是对传统要素配置的全盘推倒重来，而是对其组织方式和激励结构的辩证扬弃。它注重通过技术革新将碳汇能力、生态承载力等外部约束条件转化为驱动发展的内生要素，

并依托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的深刻重构，打通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双向转化的渠道。

从技术革新视角看，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资源循环再造、氢能开发等颠覆性绿色技术，逐步摆脱传统生产对资源能源的过度依赖，从源头上排除高消耗、高排放的生产路径，为生态文明建设构筑坚实的技术基础。从要素重构视角看，新质生产力推动劳动、技术、生态和资本四类要素创新性配置，通过碳排放权、排污权、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等机制，将过去难以量化的生态资源纳入市场交易体系，让山水林田湖草沙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的生产要素。实质上，这是将生态承载力从过去发展的“外部天花板”转化为新阶段驱动要素优化配置的“内生标尺”，进而通过价格机制倒逼经营主体高效利用生态资源，激活生态资本价值。

实践逻辑，动力重构与协同增效的运行机制

有别于传统模式下侧重“末端治理”和“单点防控”的实践路径，新质生产力从发展动力重构和治理机制革新双维度发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由被动应对向主动作为深度转型。

从动力重构视角看，新质生产力以技术革命性突破和要素创新性配置为抓手，既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让煤炭、钢铁、化工等传统行业通过数字赋能与绿色工艺焕发新生，避免“一刀切”式的产业替代；又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增长动能，从生产端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根基。

从协同增效视角看，新质生产力将资源环境要素转化为新型生产要素，建立生态数据共享、交易和流转配套机制，打通属地封闭的数据壁垒。依托人工智能和数字孪生技术对全域生态数据进行统筹整合，搭建一体化数字底座，建立覆盖全域的统一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实现精准动态监管。通过生态数据的互联互通，破除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网格化治理格局，将过去依靠人工排查的被动整改，升级为自动预警、精准溯源、闭环处置的主动防控，大幅提升生态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逻辑层面，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正视传统工业化的历史贡献，同时以绿色范式革新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塑；在内生逻辑层面，秉持辩证扬弃的方法论，将生态资源从外生变量转化为市场化内生要素，打通了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双向转化的通道；在实践逻辑层面，继承并超越了传统环保手段，通过产业绿色升级与数字治理体系构建，推动生态治理效能实现质的跃升。以上三者层层递进，精准诠释了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底色，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生产力支撑。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质生产力驱动下中国生态文化的文明贡献研究”（25BKS106）研究成果】

社会动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践行群众路线的实践形态。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开展的社会动员，为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巩固与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研究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动员，理解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早期实践，对于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社会动员的核心维度

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物质动员。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土地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它不仅反映中国农民的核心诉求，也是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具体体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我们党深刻把握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打倒豪绅地主，实行平债分田、建立工农政府”等口号，有效回应了农民的利益关切。针对群众对分田政策的疑虑，他们以“一根稻草一扯就断，一把稻草搓成绳子力量就大”作比喻，阐释团结的必要性，降低政策传播的门槛。打土豪、分田地的实践，让群众切实获得免除债税、分配土地、劳动权益保障等利益，推动党员队伍快速壮大。以物质利益为纽带的动员方式，使革命获得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以干部示范为核心的政治动员。政治信任是社会动员的“成本调节器”。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始终强调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求工作人员向群众阐释政策、带头执行任务，在扩大红军、节省经费等工作中，干部要率先垂范。例如，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苏维埃工作人员从每日四分大洋的伙食费中节省部分用来支援战争。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示范行为，强化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合法性。群众自发书写“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与工人谋利益”等标语，成为政治认同的生动注脚。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让群众建立起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信任与情感认同，成为最有力的社会动员号角。

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导向的实践动员。求真务实的作风是社会动员有效的核心保障。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求党员干部在社会动员工作中事必躬亲。在扩红动员中，根据地出台了一系列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政策，大到免除赋税、分配优质土地，小到代耕代种、代炊柴挑水等，用群众可感知的实惠强化了社会动员效果。同时，根据地建立了严格的监督机制，对脱离群众的干部进行严肃处理，确保动员工作始终接地气、得民心。

以大众传播为核心的话语动员。话语传播创新是社会动员效能提升的关键变量。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摒弃生硬说教与强制要求，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动员。例如，动员工人雇农贫农参军时，通过开欢迎会、送川资等方式激发意愿，通过组织运动会、识字班、音乐组等方式“来提高青年群众斗争的情绪”；春耕农忙时减少开会次数，将多议题合并报告，非纪念性会议尽量挪到晚上，避免妨碍生产。这些创新使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发展为全国六大革命根据地之一。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称赞赣东北苏维埃的工作说，“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社会动员的时代启示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开展的社会动员，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对于新时代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其一，坚持把人民立场作为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赣东北苏维埃“非常亲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忠实的为群众谋利益”，使社会动员工作有的放矢、精准高效。新时代，我们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其二，坚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党的先进性的具体体现，是我们党战斗力的源泉、取得胜利的坚强保证。一名党员就是党的一面旗帜。新时代，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树立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做到平常时间能看得出来、关键时刻能冲得出来、危难时刻能豁得出来，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

其三，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求真务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和工作方法。新时代，我们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健全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机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和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干实绩赢得群众认可。

其四，坚持守正创新。面对信息传播碎片化、群众认知多元化的时代特点，我们要借鉴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开展通俗化传播的历史经验，不断创新话语体系与传播载体，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将党的政策转化为群众熟悉的“家常话”，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要推动居民从“要我参与”向“我要参与”转变，通过民主协商、志愿服务、社区共治等方式，持续激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筑牢社会动员的民意基础。同时，注重分众化传播，针对不同群体特点采取差异化策略，提高工作的精准度和实效性。

【作者单位：豫章师范学院。本文系江西省社科基金项目——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社会动员研究（23XW11）阶段性成果】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动员及时代启示

□ 杨若含

红色文化如何吸引“Z世代”

□ 胡腊妹 林 涛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红色文化作为思政教育的重要资源，承载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独特功能。从革命遗址到历史文物，从英雄事迹到红色家书，这些穿越时空的精神财富凝聚着民族集体记忆，是思政课堂不可替代的育人载体。

当前，教育的重要对象转向“Z世代”，传统的教育方式面临新的挑战。“Z世代”指出生于1995年至2009年间的青年群体，作为“数字原住民”，他们习惯于碎片化、互动化的信息获取方式，与传统红色文化传播偏向宏大叙事的严肃风格存在着一定的心理距离。红色文化在“Z世代”群体面临的传播困境，反映出思政课在育人方式上亟待突破的瓶颈。

评判思政课的育人质效，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它是否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是否能够将价值引领有机融入青年可接受、愿参与的实践活动。思政育人正在从单向灌输转向意义共创、从外部说服转向内在认同，这与思政教育从知识本位转向素养本位、从学科逻辑转向问题逻辑的改革方向高度契合。让红色文化吸引“Z世代”，需要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三个方面进行路径创新。

重塑课程目标，从知识记忆转向价值内化。传统红色文化教育往往停留在历史背景、事件经过、人物事迹等知识性内容的传授上，学生记住的是时间、地点、人名，而非精神力量。考试过后，这些知识点可能很快被遗忘，遑论转化为行动自觉。知与行的断裂，根源

在于课程目标定位的偏差，即将红色文化视作背诵的知识点，而非内化的精神基因。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的根本目标不是让学生熟记几段历史，而是培养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与行动自觉。其一，培养价值判断能力。在算法主导的信息环境中，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历史虚无主义、功利主义等错误观点时有出现。红色文化所承载的爱国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等，能够帮助青年建立稳固的价值坐标，在复杂的数字生态中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判断力的培养，不是靠灌输结论，而是在具体历史情境的分析中，让学生理解革命先辈为何作出那样的选择，并在面对人生抉择时有所依循。其二，培养情感共鸣能力。红色文化的魅力在于以事感人、以情动人。思政教育应引导学生从细节中感受历史的温度，一封红色家书中的牵挂与决绝，一处革命遗址背后的牺牲与坚守，远比抽象的说教更能触动心灵。“Z世代”习惯以旁观者的姿态审视历史，思政教育要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不是局外人，而是红色基因的继承者和再创造者，激发主动传承的内生动力。

重塑课程内容，从静态讲述转向情境建构。当前，红色文化在思政课中的呈现方式，多采用背景介绍、事迹讲述、思想提炼的静态模式。这种模式将红色文化固化为既定的结论，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缺乏代入感、参与感。红色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能够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受众的特点灵活呈现，内容表达应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结论走向情境。一是依托数字技术构建沉浸

式思政课堂。“Z世代”对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有天然亲近感，借助这些技术手段，让学生走进革命遗址，置身于当年的艰苦环境，真实感受革命先辈在重大关头的抉择与坚守。当学生通过技术手段身临其境，强大的视觉、情感冲击力是任何课堂讲解都无法替代的。因此，各地红色场馆应加快数字化建设，为思政课提供丰富的沉浸式教学资源。二是挖掘红色文化背后的微观叙事。与宏大叙事相比，一封家书、一件遗物、一张老照片，这些具体的、可触摸的历史细节，更能打动“Z世代”的心灵。微观叙事将抽象的精神具象化、人格化，能让红色文化从教材上的文字转化为生动的情感记忆。

重塑教学方式，从教师主讲转向师生共创。在传统课堂上，教师是知识的权威输出者，学生是沉默的接收者，这种模式与“Z世代”互动式、参与式的信息消费习惯形成结构性冲突。促进红色文化代际传承，不能仅靠教师讲得好，更要靠学生愿意参与、能够创造。其一，依托数智技术实现精准化教学。不同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基础、情感态度差异显著，整齐划一的教学目标必然导致部分学生“吃不饱”或“消化不了”。借助学情分析工具，可以了解学生的认知起点与情感状态，设定差异化的教学目标。对于红色文化完全陌生的学生，先解决接触问题；对于有一定知识基础但情感隔阂较深的学生，重点解决共情问题；对于已经产生认同的学生，引导其进行创造性表达。其二，探索“先感后知”的逆序教学模式。传统教学遵循讲

解、理解、接受的路径，而青少年的认知规律恰恰是从感性体验上升到理性认知。让学生先接触红色文化的具体载体，参观一处遗址、阅读一封家书、观看一段影像，记录第一感受与疑问，再引导他们探究背后的历史与精神，这种以感促知、以知深化的路径更符合“Z世代”的认知特点。

“Z世代”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是中国未来的领导者和建设者。推动红色文化传承创新，“Z世代”是一个重要群体，也是检验传承创新效果的重要方面。让红色文化更好地吸引“Z世代”，就是思政教育在青年群体中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的重要实践。这一过程无法通过强制灌输完成，而要在坚守精神内核的前提下，不断变换表达形式、创新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参与热情。当红色文化从课堂上的经典案例转变为青年生活中的精神坐标，从教材中的学习任务转变为心灵的情感共鸣，从教师主讲的单向输出转变为师生共创的意义共享，它所承载的红色基因就能真正融入“Z世代”的精神血脉。

【作者单位：南昌航空大学航空服务与音乐学院。本文系2025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红色文化育人研究》《模因传播视域下红色音乐文化在Z世代青年中的传承机制与创新路径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HSWH25097）、南昌航空大学2025年教改课题《模因传播视域下红色音乐文化融入Z世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jy25015）阶段性成果】